

浪淘沙丛书

宋衍申 著

怎样当官

——
五千年的答辯

LANGTAOSHACONGSHU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怎样当官

——五千年的答辩

宋衍申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怎样当官——五千年的答辩

著 者	宋衍申	封面设计	尹怀远
责任编辑	游 娜	版式设计	胡学军
责任校对	蓝 熙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方圆印业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977-9/Z·183
定 价	25.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自序

这是1996年——2000年间，我在《浪淘沙·史海钩沉》上发表的文章集结。

此集通过对我国古代为官者正反两方面的真实记录，集中回答了一个问题：怎样当官？

怎样当官？乃古今社会一大焦点问题。为官者探讨它，思想家们探讨它，普通百姓也关注它。

要当官，先做人

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对此就有论述。《礼记·大学》讲：“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做人。只有做好人，才能当好官，治好国，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古代修身的标准是什么？孔子讲“恭、宽、信、敏、惠”，西汉大儒董仲舒把它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这五方面道德品质的修养，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被奉为“五常”。常者，伦常也、纲常也。“五常”成了古代人格的崇高追求，也成为古人眼中伦理社会的终极目标。

为了追求那种理想境界，孔子认为各级官吏（包括国君）应率先垂范修身，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古代官吏，对儒家学者主张的为官之道都是认同的，他们刻意约束自己，去追求人格和为政的崇高境界。

汉文帝的躬行节俭，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海瑞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清初于成龙的清正廉洁……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官要为民做主

《说文解字》“段玉裁注”释官为“治众之意”。众，是平民百姓；治，有多种涵义，既有统治之义，也有领导、管理之义。就统治之义来说，官，凌驾民之上，是民的老爷；就领导、管理之义来说，官与民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互为依存。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民都是社会的基础，没有民，就没有官存在的条件。因此，中国奴隶制时代末期，就诞生了民本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许多思想家所一再论述。《尚书》讲：“民唯邦本，本固邦宁”；《老子》讲：“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管子》讲：“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荀子》则把民比喻成水，把君（官吏的总代表）比喻成舟，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说明，当好官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得民心、合民意。

在古代社会，原则上来说，官吏们只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其政治举措是不可能得民心，合民意的。但，如果不给民以最起码的生活条件，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就会失掉，所以，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去取悦于民。当官要为民做主，在古代社会也是正理。

怎样为民做主？

孔子讲：“为政以德”，《尚书》讲：“施实德于民”。德，在这里就是民本思想。当官者，必须通过自己的行政，给民众带来摸得着、看得见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恩惠。这其中就包括限

制对民的过重剥削和压迫，限制残害民众的各种恶势力等等。

汉初，刘邦因取民心而取天下，东汉的董宣执法敢斗皇亲国戚，宋代的赵抃身为御史而不循私情，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以重法惩贪官，近代的林则徐认真禁烟……都是德政的行为，因而都被千古传颂。

讲真话，是当官者最重要的品质

各级官吏，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担负上传下达的使命。所以，一个好官，在上传下达时，必须有讲真话的品质。

讲真话，也叫直书。在古代社会，直书是十分艰难的事。

春秋时，齐国太史因直书了权臣崔杼弑君之事，兄弟三人被杀；汉武帝时，司马迁因替李陵开罪，而遭宫刑……相反，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而掌朝廷大权；明代宦官头子魏忠贤靠上欺下瞒而势炎熏天……

所以，古代社会有“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史通》）的民谚。

但是，从根本来说，任何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必须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否则，决策者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假的，就只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如果做了错误决策，还不肯改正，就有招致祸乱的危险。

东汉初年，武威太守任延，上任之前，得到光武皇帝刘秀的接见。刘秀指示他要好好听上级领导的话，并且说明，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升官。任延则说：“忠臣无私，当大臣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履正奉公，如果上级领导说什么，下级官吏就不分青红皂白听什么、干什么，那并非皇帝之福啊！”任延不唯上、只唯实，表现了一个古代官吏难能可贵的求真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刘秀的理解，不但未怪罪他，还称赞了他。唐初的魏征，一生给唐太宗李世民提了200余条意见，有的意见十分尖锐，弄得李世民在众臣面前下不了台，一怒之下，几乎杀了魏征。但是，经深思熟虑后，李世民还是听了魏征的那些真话。魏征去世，李世民为

失掉这面明镜而痛哭流涕。

古代思想家们提倡“君明臣直”就是这个道理。

当官莫发财

“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古代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但，不是正理。

有远见的官吏，深知利用权力去发财，只会加重百姓负担，毒化社会风气，最终会起到葬送统治者整体利益的坏作用。所以，他们宁肯牺牲掉发财的机会，也要保持清廉的品格。

东汉的羊续，当了太守，妻儿还自食其力，不肯贿赂上级而受穷一生；杨震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坚持辞金不受；宋代的包拯，不仅自己不贪，还给子孙立下家法：有人贪财，就不准姓包，死后不准进祖坟……

清正的官吏，在古代社会虽然凤毛麟角，却弥足珍贵，是古代文化的精华。他们的名字同他们的清正品格一齐流芳百代。可以说，清正为官者，虽然自己受了委屈，甚至丢掉了生命，却弘扬了人间正气；虽然没有发财，却拥有无可比拟的精神财富。这种清正的精神不仅惠及子孙，也惠及全社会。而那些佞官污吏，最终的下场，不仅人、财两空，而且遗臭万年。

今天，为官者不再是百姓头上的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了。官的性质不同了，不过，为官的许多道理还是相通的。

先哲们总结的为官之道，许多都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可为今鉴。

这便是此集出版的意义。

宋衍申

2001年7月

目 录

- 001 自序
- 001 舆论监督——中国最古老的监察形式
- 007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 012 举贤任能——春秋世风
- 018 晋文公以信而强
- 023 智伯刚愎而亡
- 029 商鞅取信于民
- 036 孟尝君礼贤下士
- 043 魏文侯尊贤用贤
- 049 秦用赵高而速亡
- 057 刘邦取民心而取天下
- 062 汉文帝以俭约节欲自律
- 067 张释之执法不滥
- 071 汉武帝迷信鬼神险失江山
- 078 卜式爱国无私
- 085 直谏不屈的汲黯
- 093 霍光给子孙留下灭族之祸

- 097 限制亲属特权的马皇后
- 102 “强项令”法不阿贵
- 106 杨震廉正，子继孙承
- 112 梁冀骄奢横暴乱国亡家
- 119 不惧强横的陈蕃
- 125 穷官羊续
- 129 曹操用人之得失
- 135 张昭的忠谏
- 141 西晋王朝因腐败而灭亡
- 148 苻坚因骄而败
- 153 北魏孝文帝赈灾
- 159 无私无畏的高允
- 166 沉湎酒色而亡国的陈后主
- 171 隋炀帝加重百姓负担而速亡
- 178 隋朝的政府监察与国家兴亡
- 184 唐太宗重视教子
- 188 贤内助——长孙皇后
- 194 勇于进谏的魏征
- 202 为官刚正的狄仁杰
- 210 太平公主追求特权而丧身
- 217 刚正守节的颜真卿
- 225 唐朝的官吏考核制度
- 231 李存勖好俳优而亡

- 236 盛世贤相王旦
- 244 宋仁宗用谏官推进改革
- 250 吕端大事不糊涂
- 257 铁面御史赵抃
- 262 以天下忧乐为己任的范仲淹
- 268 欧阳修以举荐人材为己任
- 274 为官清正的包拯
- 278 司马光一生勤俭
- 283 司马光和他的《谏院题名记》
- 289 王安石用人失误
- 294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苏东坡
- 300 腐败亡国的宋徽宗
- 308 贾似道祸国殃民不得善终
- 316 文天祥和他的《过零丁洋》诗
- 327 宋代不杀言官
- 333 朱元璋重吏治
- 339 明太祖勤俭
- 347 刚正廉洁的海瑞
- 352 擅权贪虐自取灭亡的刘瑾
- 359 明朝大贪官严嵩
- 365 魏忠贤祸国遭磔尸
- 374 鳌拜擅权跋扈
- 381 “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

385 清朝头号贪官和珅

389 清朝的科道官

396 林则徐办事认真

404 近代爱国学者魏源

409 主张“富强救国”的郑观应

舆论监督——中国最古老的监察形式

监察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御史”，就兼有监察的使命了，但尚未产生专职监察机构。到了秦代，朝廷设御史台，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标志中央政府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监察机构，在地方政权中设立十三部刺史，监督地方长官的工作。从此，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历代相传，不断完善，成了古代政治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调节国家机器制衡器的作用。

那么，在“御史”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远比春秋战国到现在的时间长得多），无论是在无阶级的原始时代，还是在奴隶时代的初期，就没有监察了吗？不。不但有监察，而且有着最为广泛，也最为民主的监察形式——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中国社会最古老的监察形式。它诞生于远古，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至今天还是社会监察的最基本、最有力的监察形式，成为长盛不衰的一种监察形式。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原始的舆论监督，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未尝不是一桩有益的事。

大约从 100 多万年前到公元前 21 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的原始时代。

这个时代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自然也就不存在后来的阶级社会中那种按照统治阶级意志制定的行政监察

制度。但是，自从形成人类那一天起，人们靠个人难以独立生存，自然形成了一定的群体。有了群体，就会有处理群体内部事务的工作。处理的办法，没有任何的强制手段，完全靠成员之间集体讨论来决定。集体讨论的召集人，就是最初原始群的首领。这个首领所作所为受的约束便是这个群体成员的舆论。

原始人的舆论也不是随心所欲而发，而是依据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习惯而发，那种社会习惯，就等于不成文的习惯法，谁破坏了它，就等于破坏了原始群体的利益，众人可群起而攻之，严重者被逐出群体之外。在那种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离群是不可能独居的，所以被逐出群体之外，无疑等于判处死刑。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年老时，想寻找一个接班人，有人提议让尧的儿子丹朱接班，尧了解自己的儿子，认为不合适，征求四岳（四方首领）意见，四岳推举舜，经过几年的试用，尧和四岳皆认为舜是贤者，尧死后让舜接班，舜谦让于丹朱，可是诸侯不到丹朱那里去朝拜，有事不找丹朱而找舜，百姓不颂扬丹朱而颂扬舜。所以，舜不只是尧禅让得位的，更是群众选举的首领。这充分表现了群众监督的作用。

舜想惩处四个坏人：驩兜、共工、鲧、缙云氏。这四个人是否真正可以惩处？舜“宾于四门”（接见四方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得到四门一致同意，才流放四个坏人。

又据《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夏代的太康，身为首领，不务正业，到洛水之滨去游猎，十旬不归，众百姓看不下去了，由有穷后羿出头，拒绝太康再任首领。

这些事例反映了原始社会按习惯法制裁首领的痕迹。

在原始部落及阶级形成初期的社会里，首领们并不是被动地受舆论监督，而是主动地创造条件，让众人来监督自己。

据《管子·桓公问》记载：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

翻译成现代语是：黄帝时代设立众人议事的明台，通过众人在明台上议事中的表现，发现贤能的人；尧的时代设立询问下情的衢室，听取众人的意见；舜的时代设立标志告善的旗帜（从而让众人把什么事是善事，什么事是不善之事指出来），首领可以做到明辨是非，不被蒙蔽；禹的时代在朝廷上设立谏诤之鼓，作为众人向首领报告信息的工具；商汤时代在众人聚集的地方，设立一处叫做总街的处所，以便了解众人对首领的议论；周武王时代设立灵台让众人反映情况，而使贤能的人得到进用。

在另外一些古代典籍中，还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夏禹设立五种发出不同音响的乐器，让众人击打不同类型的乐器报告不同类型的事件。

所以，不论是明台、衢室、告善之旌、谏鼓、总街、灵台，还是诽谤之木、五种乐器等等场所或器物的设立，都反映了上古时代首领是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

首领们接受舆论监督，不仅表现为在朝廷上听取意见，还表现在派人到民间去采风。负责采风的人叫“道人”、“行人”。这些人每到春季，敲着木铎（铎）行进在四乡八野之间，众百姓听到木铎之声，便纷纷从家中走出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给“道人”或“行人”，许多人还把种种喜怒哀乐编成合辙押韵的歌谣唱出来或吟诵出来。“道人”或“行人”将其记录下来，并进行一定的加工整理汇报给首领。首领们通过这些从百姓之中直接反映上来的歌谣中，了解民间疾苦，决定大政方针。现存的《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从无数这类歌谣中精选出来的。当然

《诗经》中的“风”只限于西周这个时代，实际上更以前的时代也会有这种“风”，只是限于种种条件，未被保存下来罢了。

从《诗经》的“风”中，可以看到众百姓对各级首领的监督是毫不保留的。

在《东山》一首诗中，远征在外之人诉说征战之苦。《硕鼠》一首诗中，把不劳而获之人比喻成偷吃粮食的大老鼠。《七月》一首诗中，反映百姓一年四季辛苦劳作和农家姑娘悲怨情绪……总之，都是有话即说，实话实说，看不出有任何害怕打击报复的担心。

《诗经》是诞生在西周这个阶级社会初期的作品，那么在尚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众人肯定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人类社会初级组合形式是按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部落，这时的部落首领很自然的都是年高德重的老祖母和老祖父。部落中一切决策自然都是有利于部落中全体子孙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产生了部落联盟，联盟由小而大，一个联盟中的部落也会越聚越多，越是民主的联盟，发展的就越快、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就必须定期和不定期召开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联盟的首领为了掌握民俗民情，也经常到民间亲自访问。据说：舜在位时，每五年到各部落中访问一次（由于部落很多，舜的访问工作日程自然十分紧张）。各部落首领要忠实向舜汇报工作。我们可以称这种访问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民主监督。

舜根据直接间接掌握的各部落情况，决定奖惩。《尚书·尧典》记载舜对各部落首领“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翻译成现代语：听其言，观其行，行其赏）。对不称职的首领实行流放或处死。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对各部落首领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经过三次考核决定部落首领的升降和赏罚。舜对“四凶”（共工、驩兜、鲧、缙云氏。亦有将缙云氏更为三苗

之说)的流放,便是在充分掌握了他们的劣迹后做出的重大决策。

原始的舆论监督,发展到后来,往往体现为贵族元老、贵族议事会对最高首领的监督和制约。在商代,伊尹下放太甲便是一例。伊尹是商王朝开国之君汤王的师傅,他辅佐汤王消灭了夏桀王,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功臣。中壬死后,伊尹策立太丁之子太甲为王。但是,这个太甲,从小养在深宫,不懂如何做王,对汤王所建立的良制美法,一味破坏,伊尹便以元老重臣的身份,把太甲强迫下放到桐那个地方去,让他经受锻炼,悔过自新,经过3年下放的苦痛锻炼和深刻的反思,太甲的思想认识得到不小的提高,伊尹才把他迎接回来,重新当王,并严厉地训诫了太甲一番。

伊尹、太甲的时代已是奴隶时代了,但它还保留了这种下对上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可见君主专制的制度,并不是一进入阶级社会就立即产生的。天下权力集中到国君一人之手,也有个渐进的过程。

西汉以后,儒家被独尊,被儒家所赞扬的尧、舜、禹逐渐被神圣化,似乎尧、舜、禹都是天降的圣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办的事件件圣明无比。其实尧、舜、禹本人自视与众人并无多少高明之处。无论是尧推荐舜,还是舜推荐禹,被推荐者总是一让再让,不敢就位,恐怕自己能力不济,担当不了大任,及就位之后,他们每天工作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以大禹来说吧,由于父亲治水不利的教训,他受命之后,倍加勤谨焦思、率先垂范,居外13年,过家门数次,而不敢入。大禹治水,肯定有多次失败的教训,包括他父亲鲧堵而不导的教训,才使他最终寻出以疏导为原则的治水方案。这中间,肯定会有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千百万群众的舆论作用,只是后来的史学家的英雄史观作

怪，把成功和胜利皆归于大禹一人名下，才令后世的浅见薄视者，不去深究，误以为大禹是天纵之圣！今天，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如果说大禹乃至舜、尧是圣人，那么首先是因为他们重视民意，生活在劳动群众之中，注意倾听群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的结果。

今天，我们为了监督人民的公仆，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但是法规再完善也不可能完全代替群众舆论的监督，只有舆论上的民主监督与法治并行，才可使公仆们不法行为得到较好的遏制。

我们应十分重视群众的舆论监督！